







2021年11月號

Foodpanda 工潮之後......

陳家偉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

Foodpanda 的工潮已過了差不多一個月了。送餐服務是全球急速發展的新產業,因此,可以想像的是,類似的工潮還會繼續。事實上,今次工潮帶給我們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。

1. 國安法下的工潮

今次的工潮深受香港及國際媒體的關注。從現場觀察,30-40 記者在場等待守候,而警方更動員超過以百計的警察在界備。這次工潮是自國安法,職工盟解散後第一個工潮,規模雖然不大,亦沒有上街,但傳媒關注程度卻出乎意料之外。

職工盟解散對香港勞工運動來說,深受打擊,但勞工的問題不會停止。送餐服務更是新興行業,吸引少數族裔及年青人參加,因為學歷及其他要求不高,參加離開都容易,但當中的勞資關係 模糊不清,美其名是「自僱」,是「自由身」,卻處處受餐飲平台控制。由於送餐服務競爭越來 越激烈,餐飲平台不斷削減工資,做成今次的工潮。

工潮雖然過了,但有關的勞資關係本質並沒有改變,因此,有關的勞資矛盾是會隨時爆發。國安法後,本地工會深受打擊,勞工團體也靜了下來。但勞資關係卻仍然可以十分緊張。一旦工潮爆發,政府、工會/勞工團體、工人及企業的關係就會重新定位。政府指控工會/勞工團體煽動工人,但工會過去不也是扮演了溝通政府、企業及工人的橋樑嗎?工會有責任維護勞工權益,這是工會的天職,當中就必然挑戰政府。今天工會被打壓,政府有能力直接面對企業及工人嗎?坦白說,今天的特區政府沒有這樣的能力,也沒有這樣的人才。

2. 國際運動的要求

在送餐服務中,Foodpanda 及 Deliveroo 兩間餐飲平台,壟斷了香港 95%的市場。這兩間都是

跨國企業。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(工委會)和工人跟兩間公司談判時,香港的負責人都不約而同地說,這是總公司的決定,要請示總公司。言下之意,處理香港餐飲平台的勞資關係,不只是香港的事情,而是國際的事情,是要改變跨國企業整體體制的問題。這就涉及國際勞工運動的事情,遠比一個地方工潮來得複雜。

工委會對過去製造業的全球生產鏈 (global supply chain) 的國際運動是有些經驗,但餐飲平台,跟全球生產鏈運動很不同,但本質仍是國際資本主導整個產業及有關的勞資關係。這是一個全新的國際運動,國際工會也十分關注國際餐飲平台在不同地方具體的情況。然而,這又回到國安法的問題。要處理這一切勞資關係不可能不跟國際社會不同界別聯絡,也需要國際運動的支援,這會否踏進國安法的紅線,這是誰都說不清楚的事情。但是,勞工問題卻是清楚放在我們面前。

3. 種族共融還是種族衝突?

今次 Foodpanda 的工潮,跟兩年前的 Deliveroo 工潮一樣,都是由少數族裔發起。少數族裔在香港的就業一直處於弱勢的情況,只能找一些體力勞動的工作。在送餐服務中,少數族裔跟香港華人不同,少數族裔很多都在這行業工作多年,而華人不少是兼職或只看為臨時工作。當單價的工資被削減時,實則華人都有很大的不滿,但不少人看這只是過渡性工作,但少數族裔的工人,認定自己在這行業為長期工作。工資的變動,就會十分緊張。

兩次的工潮都是由少數族裔發起,華人表面很少參與。但今次 Foodpanda 工潮,工人發起拒接 餐單運動,其實有很多華人參與,才可以令 Foodpanda 那麼快跟工人談判。在送餐服務中,少 數族裔及華人是有不同關注,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合作空間,這也是推動香港種族共融的契機, 這需要工會及勞工團體的努力,政府似乎在此還未準備。

4. 宗教合作的新方向

送餐服務既是推動香港種族共融的機會,也是推動宗教合作的機會。種族共融及宗教合作一樣, 很多時不能只在某些討論會可以達到,更多是在具體的事情中,慢慢地發生及孕育。送餐服務 涉及大量的少數族裔人士,主要是巴基斯坦、印度及少數尼泊爾族群。他們都有不同的宗教信 仰。

現時關注送餐服務的勞工團體中,有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及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。教會定期和不同宗教有對話交流,或許少數族裔的勞工權益可以成為大家共同關注的事情,也可將宗教合作,由對話而具體變成行動的合作。教會的兩個勞工團體早已在此工作,為教會和其他宗教合作打下基礎。









2021年11月號

再思工人司鐸的經驗

陸漢思牧師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執委

在我最近回港,因檢疫要求,我須要在酒店隔離三星期,我因而有時間閱讀一本長達六百頁有關法國勞工司鐸(workers priests)的歷史。就個人來說,法國勞工司鐸的歷史對我有很重大的影響,這是引導我後來參與城市鄉村宣教運動 (Urban Rural Mission)。

1943年,還在二次大戰時,那時有一書面世,名叫《法國:宣教的國家?》(France, Country of Mission?)。書中提到從教會的角度,法國人可以分為三種類型:實踐信仰的人民、對信仰冷漠,但在生活中保存某些教會傳統的人民、及完全離開基督宗教的人民。概括來說,八至九百萬的工人都屬於第三類型的。在工人集中的社區中的牧區,好像自成一國,跟外面社會沒有關係,工人跟外面也沒有接觸。因此,在那裡需要的教會使命,不是將人帶入教堂內,而是走出去,將福音帶到工人階層之中。《法國:宣教的國家?》這本書確實有煥起人心的作用。

另一個引發勞工司鐸運動的要素,就是在二次大戰後,大量神職人員及神學生從德國回到法國。他們當中有部份是跟隨戰敗法國軍隊,被當為戰俘被送到德國作苦工;有部份人是參與法國保衛工作,最終被送進集中營。最後一部份是大量神學生被召到德國打工,或那些神父受到某種保護,而到德國去牧養為數七十萬在德國作強迫勞工的法國工人。這些神職人員及神學生發覺自己極度融入人民的生活中,沒有跟人民有任何隔離。

1944年初,因著教會高層的支持,一個新的宣教工作在巴黎開展。當時想法是神職人員如何在工人群體中,從傳講福音而變成活出福音。這不是為了現存的堂區增加新人數,而是將教會植根在工人群體中間。由 1947年開始,這個新的宣教運動已發展到其他城市。神職人員慢慢發現,工人群體間有很多素質是他們從前不知道的,例如團結、對未來新社會的盼望及幢景、對人性美好的信任、追求世界的和平。神職人員亦跟共產主義的激進人士找到共同關懷的地方。

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前,羅馬天主教會跟今天的模樣很不同。神職人員跟一般人民是分開

的。他們穿著神職人員的黑袍,彌撒及其他禮儀都是用拉丁文。在冷戰時期,教庭不想神職人員跟共產黨員走在一起。教宗庇護十二世(Pope Pius XII)公開宣稱:「若要我在宣教功效及神職人員的操守中作選擇,我會選擇後者。」自 1954 年 3 月 1 日開始,教庭命令所有勞工司鐸停止工作。教庭突然其來的決定,不但在教會內引發討論,在教會外亦引起關注。工人司鐸們對教庭命令的反應紛紜。當中有跟隨教宗的決定,亦有人不理會教宗的要求,繼續他們對工人的服侍。這禁令維持了十一年,直至教宗保祿六世(Pope Paul XI)繼位後,准許少部份神父恢復工人司鐸的工作。到了 1979 年,工人司鐸的數目比 1954 年時的數目已多出十倍,工人司鐸運動繼續發展。

在香港,過去多年天主教神職人員一直爭取在工廠工作。他們既有工廠生活的經驗,亦能跟工人一起。但是,這樣的努力,雖然對神職人員是很珍貴的經驗,但仍和一生跟工人群體打拼的事奉很不同。在香港,唯一跟工人群體走得最近的天主教團體是耶穌小姊妹會(Little Sisters of Jesus)。

香港工業化的高峰在上世紀 60-70 年代,但那時的工人群體仍跟法國工人群體不同。香港缺乏一個有長遠歷史及富有革命經驗的工人運動。很多法國工人對教會言論不是不理睬,就是採取敵視的態度,但香港大多數工人卻感到教會教導,是和他們的生沒有關係,甚至有時看教會的教導為笑話。但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經驗,卻清楚顯示出耶穌基督的為人,是如何可以感動工人去跟隨耶穌。

自上世紀 60-70 年代,香港經濟已不斷轉變。過去的工廠區,有著不少聘請數以百計工人的工廠,但這一切不再存在。前線工人散落在不同角落。然而,香港仍然是一個宣教的地方,這裡仍然需要有人將福音的訊息,轉變成工人能懂能接受的訊息,這使命卻從沒有改變。









2021年11月號

foodpanda 工潮媒體報道集

端傳媒 | 外賣車手罷工後記:在演算法和馬路之中,他們仍然不堪一擊

立場新聞 | 【特寫】工傷、罷工後 困在外賣系統夾縫中的 foodpanda 車手往何處去?

立場新聞 | 【Foodpanda 罷工】地區 group、翻譯組、YouTuber 後工會時代 一場工運是如何 誕生?

明報 | 未來城市: 罷工揭示零工經濟問題 外賣員可合作爭權益?

工委會需要您的支持

【轉帳捐款】

請將捐款存入工委會恆生銀行賬戶 227-445210-001,將入數紙電郵至 info@hkcic.org.hk

【支票捐款】

請將劃線支票(支票抬頭為「香港基督教工業委會有限公司」)寄回工委會辦事處

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
Hong Kong 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
香港九龍灣常怡道 33 號 914 室
914, 33 Sheung Yee Road, Kowloon Bay, Hong Kong
電話 (852) 2366 5860
傳真 (852) 2815 1739
電郵 info@hkcic.org.hk